

编辑故事



祝出版同仁们身体健康

主持了《文艺报》近四年的“编辑故事”版面,我从未有今天的良多感慨。

8月下旬,我到济南参加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参加了两次重要会议并作交流发言,一个是关于加强编辑人才队伍建设的座谈会,一个是山东大学出版学院主办的关于AI时代出版人才需求的小型论坛。会议之余,我召集了山东出版界的老朋友相聚——这是我的新“毛病”:喜欢访友。

我在江苏人民出版社担任社长多年,与人民出版社和全国各地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以及许多出版社社委会成员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相互走动频繁。会议间隙,我约山东人民出版社原社委会成员一起见面。山东人民出版社在原社长胡长青的带领下,曾经取得过耀眼成就,“两个效益”在全国名列前茅,与当时华东地区的江苏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和福建人民出版社轮番领风气之先,比学赶帮超。我曾多次只身前往山东人民出版社学习,与他们社委会成员特别是社长胡长青建立了深厚的兄弟般的感情。七八年来,与其他几个出版社一样,山东人民出版社的团队也已经换了人马,社委会成员大都各奔东西:社长胡长青去了传媒公司,副社长王路去齐鲁书社担任社长,总编辑杨大卫去山东教育出版社担任社长……胡社长像蜡烛般地光照他人、燃烧自己。

可是在计划见面当晚,王路社长并没来,大卫社长也没有来,两人都生病了,当晚见面后大家几乎是架着长青社长下了台阶,原来他因为长年伏案编稿,患了严重的腰椎病。四个要好的社领导中,只有发行高手王伟副社长健壮如昨,健康地退休。

雨夜中的济南城,我茫然地在街上流浪,回忆起曾经健康的他们和我一次次相聚的岁月。

在凤凰传媒搭班子期间,出版人余江涛和我形成了共识:饭是钢,但人不是铁,经不起百炼,甚至经不起一炼。我们希望给各出版单位增加一些压力,但不要压垮他们。

今天本版两篇文章的作者是两位年轻编辑,一位是凤凰传媒出版部副主任卞清波,一位是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朱强。卞清波深情地回忆起与7月刚过世的思想史大家张岂之先生的交往以及做他著作责任编辑的往事,朱强则用优美文字讲述了他与鲁迅文学奖获奖者交往的温暖细节。他们都在现在岗位上做出了出色的成绩,未来或许会面临更大的压力。祝出版同仁们身体健康。

——主持人 徐海

清芬远绍,永沐后学

——缅怀张岂之先生

□卞清波

2026年7月19日,张岂之先生走了。

消息传来时,我怔了很久。虽然先生已是百岁高龄,虽然心里也隐约做过准备,但真的听到这个噩耗时,还是觉得不真实——恍惚间觉得先生只是又去伏案了,又去回信了,又在对哪位后生的论文提出朴素却切中肯綮的修改意见了。

我与先生的缘分,始于2015年。那一年,我开始负责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普及读物项目编辑出版工作。先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是这个项目第一批立项的选题,于是我很快与先生取得了联系。

2016年7月30日,时任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的徐海带我去西安,到先生家中拜访。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先生。他端坐在书房里,说话不疾不徐,目光沉静而有穿透力。我们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的编辑思路,谈了出版进度,也谈了一些学术话题。临别时,先生将那段时间陆续整理出来的《张岂之教授论学书信选》初稿郑重地交到徐海社长手中,社长又转交给我。那天我接过书稿,感觉接过来的同时还有一份信任、一份谨慎、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当时我尚未充分意识到,此后的数年交往,将成为我受用终身的精神旅程。

先生是江苏南通人,我是江苏徐州人;先生曾在重庆南开中学读高中,我是南开大学毕业生。这两重身份,让我隐约感到先生从一开始就对我多了一份天然的亲切。后来,先生偶以“南开校友”“江苏小老乡”称呼我,每次听到,心里都生出一种莫名的自豪感。仿佛自己沾了这两重身份的光,便能离先生的学问与人格更近一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于2016年10月出版。先生对这本书的出版颇为欣慰,这确是一部凝结着他数十年学术思考心血的力作。在前期主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丛书”的基础上,先生接续探索,做了新的综合与提炼——天人之际、道法自然、居安思危、自强不息、诚实守信、厚德载物、以民为本、仁者爱人、尊师重道、和而不同、日新月异、天下大同。这十二个核心理念的系统概括,可以说是先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系统、成熟的理论表达,也是他晚年重要学术创见的集中呈现。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与先生见面的次数很少,但阅读书稿时带着学习和思考,自感与先生产生了很深的思想交流。文稿干净利落,极少需要大改,先生在核心理念的阐释方式、概念的界定角度、普及性表达的尺度把握上,都给了我很多启发。尤其令我敬佩的是,书中这些提炼与思考,后来在“两个结合”的宏大命题以及新时代传统文化观的建构中,竟呈现出如此深广的呼应——学术研究的前瞻性与现实关怀之间,原来可以达成如此深沉的默契。先生让我看到,真正的学问从来不闭锁于书斋,它总是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回应着时代的命题。

紧接着,我们又开始推进《张岂之教授论学书信选》的编辑工作。这本书收录了先生数十年间与学界同仁及研究生的通信,内容涉及学术讨论、论文指导、学问心得等诸多方面。编辑过程中,我不断被那些言约义丰、切中肯綮的信件打动,也一直期待着有机



朱强

《百花洲》办刊47年来,一直秉持“以文会友”的传统。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编辑部每年都会邀请一大批活跃于文坛的作家来江西采风。编辑与作家之间的美好友谊,多在水山间缔结。近年来,依托江西出版传媒集团实施的“名刊重塑”工程,《百花洲》应时而动,接续传统。去年,我们重启了中断35年的庐山笔会。为呈现文学景深,编辑部特意制作了一个小册子《共攀文学名山》,收入作家当年来庐山采风的照片与作品。这份珍贵记忆,仿佛时间赠予大家的一件特殊礼物。作家们的才情和真性情都在“栉风沐雨,咏而归”的过程中得到真实释放。这次《百花洲》策划、编发的两部作品获得鲁迅文学奖,也可算是近几年刊物与作家美好互动结下的硕果。

——

艾平老师的作品我早就读过,不可谓不熟悉。她的作品《隐于辽阔的时光》获鲁奖提名后,愈发引起了我的关注。她的草原书写,不仅有草原人的生活,更将迁徙、离别、相逢的种种际遇,汇聚成深沉的人间悲欢。草原在天地之间,也在人心深处。带着文字里的情共与共鸣,我想我一定会遇见这位散文家。

2023年秋天,《百花洲》联合《人民文学》在江西安远举办生态文学笔会,艾平在受邀之列。她从呼伦贝尔来江西,须辗转飞机、火车、汽车。这一趟下来,大家各有收获。但我只字未提组稿的事。作家愿意把稿子交给编辑,凭的是一份信任,这份信任,是需要时间来建立的。巧的是,没过多久,《人民文学》在泸州又举办了一场采风活动。我平时也写点散文,编辑之心的这点爱好,倒也让我有了结交四方朋友的机会。没想到艾平也来了,大家走了很长的路,终于在一个陌生地方相见。因为上次交往得非常愉快,这次就更是熟络了。一路上,我们各自抒发自己的观点,很多话只有在相似的精神场域中才能心神领会。那天早上,大雾弥漫。我们登上当地的一座

会再次当面请教。这样的机会不久便来了。

2017年3月,先生来南京参加学术会议,为编辑们做了一场题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与意义”的讲座。那天讲座结束后,我有点冒失地提了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先生提炼的十二个核心理念中有“日新月异”一条,我因与先生同为南开校友,便问他:南开的“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校训,是否在先生提炼核心理念过程中产生影响?先生回答得很干脆:“没有。”他说,核心理念的提炼,关键在于对史料的充分掌握和对问题的深入探究,不因个人经历而转移。但他随即又说,他对南开、清华都怀有深厚的感情。那次回答,让我对先生的“实事求是”有了更真切的体会。先生说“没有”时的那份坦然,与随后补充的那份温情,一面是学理的客观,一面是情感的真诚,这二者在他身上从不抵牾,反而相得益彰。

2017年12月,我参加在西北大学举办的《张岂之教授论学书信选》发行仪式与座谈会。会上,我作为责任编辑介绍了编辑出版过程;会后,先生为我题赠——“这本书能顺利发行,其中有你的汗水,十分感谢”。先生的字写得刚劲有力,落笔之郑重让我感动。我捧着那本书,觉得它已经不只是一本出版物,更承载着一位前辈学者对后学编辑的尊重与肯定,那份情意比任何奖杯都来得珍贵。

此后几年,我又数次拜见先生。2018年12月,先生应邀到无锡参加首届江南文脉论坛,我恰好承担部分会务工作,自然到先生房间拜访,先生坐在没有靠背的沙发上,饶有兴致地与我谈了很久。2019年7月,全国书博会在西安举行,已任凤凰传媒总编辑的徐海老社长又带我到先生家中拜访,先生和弟子方光华教授、弟子兼助手陈战峰博士与我们进行了深入的交流。2020年7月,时任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梁勇带队,徐海老社长又带上我,利用出差西安的机会到先生家中拜访。每一次见面,先生都精神矍铄,谈兴甚浓,话题总不离学术与教育。

在这些交往中,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先生的多重风范。作为一名学者,先生是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的泰斗,是“侯外庐学派”的承前启后者。但他最令我敬佩的,还是他处理复杂学术问题时的思维方式——他总能以极快的速度抓住问题的关键,用最朴素的语言点出症结所在,然后给出明确的解决路径。这种能力不是靠博闻强记就能获得的,背后是数十年如一日的学理训练与问题意识。我在南京大学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数次就相关问题向先生请教。先生每次都是寥寥数语,却能让我豁然开朗。

作为一名教育家,先生一生甘为人梯、奖掖后学,带领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团队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和博士后500余名,《张岂之教授论学书信选》最直接地体现了他指导学生的风格——每一封回信都极具针对性,不说空话,不绕弯子,用最朴素的语言指出问题、指明方向。他常说:“学者要成为社会的良心、良知,就必须关注社会现实问题。”这句话对我影响至深。它让我明白,学

偶缘,四野平畴尽收眼底。登斯楼也,则心旷神怡,心境和环境对上了,艾平的书稿随之而来。从此以后,我们除了谈文论艺,也开启了一种合作模式。作家的使命是创作,表达“我”的发现,向读者传递真善美。但作品在人间的路,是需要编辑来规划的。艾平的作品两次获得鲁奖提名,可每次都擦肩而过,她内心的复杂,我能体会。也许上天有意如此安排,只为了成全这段缘分。我知道,这时候有一个人为她鼓劲、呐喊,是多么重要。

好作品既要有时好时机,也要有妙创意。这个创意,既在作家,也在编辑。艾平写草原和别的作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她是在草原上用一根针挖一口井,她熟悉草原的春夏秋冬,青草和白雪覆盖的大地,展示出自然温柔与残酷的两面。几十年春花秋月,艾平在草原上驰骋漫游。我想约她的稿子,无非希望读者在文字中看到一个草原人满怀深情的内心。

眼高方能望远。草原题材的书写,精准回应了近年来生态文学、边疆书写等社会关注热点,只有让个体叙事与国家话语同频,文章应时而作,才能获得更大的传播力与评价势能。而创意的妙与不妙,关键看编辑是否能够精准地把握作品的内核;作品在编辑的心里,有还是没有。

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每隔几日,我们就会通一次电话。这位既是文友也是作者的知心大姐,创作动态被我实时掌握。《百花洲》向来有一个好做法,就是书刊互动。杂志作为前沿阵地,是汇聚作家资源的平台;而出版则是产品线的延伸。20世纪80年代,《百花洲》因此衍生出“百花洲文库”等现象级书系。为了给《天生草原》预热,扩大读者的覆盖面,《百花洲》率先刊发了书里《阿哈的金牌》《雪无止境》等文字。两篇散文随即被《新华文摘》《散文海外版》转载。好作品在人间的路是漫长的,这也给编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编辑不仅需要有一双慧眼,也要有带作品到人间旅行的能力。《天生草原》出版以后,书评、宣传视频、各种媒体的推介铺天盖地,目的只有一个——让作品持续发光,增强作品在业界和读者中间的影响力。

二

刊物不仅仅是一个窗口,一个展示作品的舞台,也是连接友谊、让作家走向更广阔的文学天地的桥梁。几乎在同一时段,因为“时代气象 中国精神”重大文学创作与出版工程,我与作家胡性能在文字上有了交集。他入选该项目的作品是一部散文集,叫《江右词》,一个云南人居然对远

在文字的两岸

——《猛犸象》《天生草原》编辑手记

□朱强

在千里之外的江西有着如此浓厚的兴趣,这让我感到非常好奇。当一个人执着于做一件事时,看似毫无道理,其实他的内心早已为自己提供了充分的理由,胡性能说他的祖上,正是从江西走出去的。当赣江水道与长江交汇,摆在旅行者眼前的是两种选择,溯江而上,是湖北、四川以及云贵诸省;顺江而下,则是江淮地区。但历史上的江西商人,似乎更愿意选择溯江而上的路。江水所至,皆是乡愁。一个人走出去太久了,浮云游子意,想为祖辈生活过的土地写一本书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江右词》写得很慢,我知道这类作品硬写不得,得有寻访经历与史实依据,所以从未催稿。编辑部几次三番邀请他来江西,一来是实地感受,二来也是增进编辑与作家之间的了解。但这种非虚构写作,实在消耗心力。胡老师长期以小说家的身份活跃于文坛,小说能让他徜徉虚构的世界,找到飞翔的感觉。有一次在电话里,我劝他写写小说调整状态。但他是一个为人做事极其认真的人,生怕耽误了交稿期限。但文学创作毕竟不同于百米赛跑,得掐着秒表。两年里,在《江右词》的创作间隙,胡老师接连写出三部小说——《鲑鱼》《惊慌的鸵鸟》《猛犸象》。每一篇都是他调整自我、安放自我的结果。很多作家会把手头的几篇稿子匀一匀,分散到几家不同的刊物发表。但他却执拗地选择了《百花洲》。作为编辑,欣喜自是难免,压力固然不小,这份信任,对编辑无疑是一份不小的考验。

《惊慌的鸵鸟》发表后,反响不俗,转载消息接踵而至。有一天,胡老师说他正在构思一个中篇,但能不能写好、何时完稿,他也说不准。文字自有命数,非人力可以左右。作家在写作的煎熬中,也享受作品诞生带来的喜悦。某个深夜,胡老师发来一条短信。他说,自己因太想写好这篇小说深感愧疚,他觉得创作不该有任何预设,静静地陪伴一篇作品来到这个世界上,便是好的,哪怕一丝“想写好”的念头都不该有。我安慰他,您只顾写自己的,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此后有一段时间,我们都没有联系,我怕把外面的喧嚣带进他的世界,那里月白风清,不容打扰。

九月下旬,手机收到一条信息,是胡老师的。他把写好的稿子给我,没有留任何话。他的意思我懂——就是让我看作品。编辑对作家负责的方式,是好好读他的作品,而作家对编辑最大的信任,也是只给他看自己的作品。我平时看作品都比较快,一目十行,山随平野尽,看的是文字内在的气韵,但这篇稿子,我却生怕读快了。对作品期待得越高,读得就越是小心翼翼。



2016年7月30日,张岂之先生(右一)在家中接待来访的徐海(中)和笔者

问不是象牙塔里的自娱自乐,而是对时代、对人民的回应。

作为一名仁厚长者,先生给了我太多温暖的记忆。他叫我“江苏小老乡”,关心我的学业进展,询问我的工作情况,还鼓励我把博士论文做完、做好。那种亲切,不是客套,不是敷衍,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后辈的关切。每次拜别先生,他都送到门口,一再叮嘱“路上小心”。2020年底我调离江苏人民出版社,此后再未到西安拜访,原想等工作稍稍安顿下来、博士论文正式出版后面面去给先生汇报——如今这已成了我永远的遗憾。

先生还有一点让我印象很深,是他作为学术组织者的领导风范。2017年12月那场座谈会的组织安排之周到细致,令我至今难忘。从议程设置到人员协调,从场务布置到接待安排,一切都井井有条。先生是这场活动的主心骨,其威望与举重若轻的气度,让我想到南开的“公能”校训——那种“能”的力量,那种把复杂事务组织得妥当周全的能力,本身就是一种大学问。后来,我渐渐意识到,先生之所以能成为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的灵魂人物,之所以能带领团队完成《中国思想学说史》等鸿篇巨制,靠的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远见,还有这种扎扎实实的组织协调能力。这种“能”,与他的学术成就合在一起,正是一位优秀学者最完整的写照。

从2015年到2020年,我责编了先生三部著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张岂之教授论学书信选》《张岂之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每一部都让我对先生的学问与人格有了更深的理解。先生给予我的教益,足以照亮此后漫长的岁月。他教给我的,不只是如何编一本书、如何写一篇论文,更是如何做学问、如何做人。

先生走了。但我总觉得他没有走远。那本签名题赠的书信选,仍在我的案头。“其中有你的汗水,十分感谢”——每当我看到这句话,就仿佛又见到先生坐在西北大学的书房里,戴着老花镜,握着笔,认真地写着什么。窗外是西安的梧桐,阳光从叶缝间洒下来,照在书桌上,照在那封即将寄给某位学人的回信上。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清芬远绍,永沐后学。
(作者系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出版部副主任)

作为这篇小说最早的读者之一,我阅读到的,不只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在时代变迁中所做的无可转圜的抗争,也看到作家创作时,浮动在内心的复杂情感。这种五味杂陈的心境,与小说本身形成互文关系。胡性能探讨的是一个沉重话题,但它的笔触却是轻的。小说推进过程中,不断地向读者抛出问题,比如,为什么许东生选择了与命运“死磕”。“我”明知对错,却选择沉默与转身,如果我们把生存定义为“体面、安稳地活下去”,那么小说几乎给出了否定答案——许东生失败了,他的人生像一曲逐渐湮没的哀歌。为此,胡性能显示出一丝担忧——小说会不会因为写得太勇敢而带来反作用?他心里不是很有底,我的观点恰恰相反。我觉得许东生这个人物刻画得非常出色。这个时代需要许东生,理想主义者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当今社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总在努力地适应社会,试图活得更好,但那颗曾经炽热的初心,却在悄悄融解。许东生是一面巨大的镜子,他不仅回答了“读书何为”,也让我们有勇气看清真实的自己。《百花洲》果断地发表了这篇小说,将2025年6期的头条给了《猛犸象》。稿子编定,也意味着一年将尽,但《猛犸象》在人间的旅程,却刚刚开始。

三

我有时想,在一个短视频霸占了人们大量的碎片时间,AI可以快速地产出各种类型的“文学产品”的时代,类似于《猛犸象》《天生草原》这种深层的文学表达,究竟还有多少读者?这个问题,同样适应于纯文学期刊。在读者越来越青睐“轻阅读”的网络时代,文学已不再拥有固定的模样,短剧、网文等内容已让它走向了更广阔的地带。但文学期刊永远是一方牢不可破的阵地,仍然汇聚着最优质的作家资源,仍然是文学经典化的主要路径,依然是筛选优质文学作品的重要保障。但这无疑也给期刊编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善于发现好作品,更要有参与文学产品全链条的服务与运营的能力。《猛犸象》《天生草原》不仅要在纸媒上放光,也应跳出纸媒,拥抱更广阔的文学天地。两部作品的获奖,不仅让《百花洲》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也让一位文学编辑有了更清晰的坐标。在文字的两岸,作家的“好笔力”,势必涵养和塑造着编辑的“好眼力”;而编辑的快乐,其实与创作的快乐本是相通的。

(作者系青年作家、《百花洲》执行主编)